有效监督即是爱护干部

□黄苇町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对它寄以厚望。作为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条例》，掌握思想精髓，迎接党内监督工作的新阶段。

领导干部对监督的态度，对监督制度的贯彻关系很大。因此，《条例》着重强调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这不仅包括是否廉洁从政，而且包括能否正确行使权力、坚持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监督。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仅摆出接受监督的姿态还不够。因为，如果在思想上认为自己最正确，不会犯错误，就很难感到有接受监督的需要。

一个领导干部，能从千百万人中脱颖而出，无疑在学识、胆识上都有很多过人之处；能够一步步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也是他的政绩和口碑所铺就。但因此也可能出现的另一个情况是，被往日成功所堆积出的自信，使自己可能会在复杂形势下，高估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长期主持工作的老同志，可以认为凭借丰富的经验有资格“一言九鼎”

刚刚主持工作的新干部，也可以因为很年轻就被委以重任“恃宠而骄”。

而他们所处的重要领导地位，恰恰又最容易出现认识偏差。因为地位越高，权力越大，能听到的各种无顾忌的批评就越少；而有些擅长“密切联系领导”者也会一拥而上，其博取领导好感的最大本领之一，就是对你的一切，包括缺点都赞不绝口：无视必要的民主程序，是因为“办事有魄力”；不坚持原则，是因为“为人宽厚”。如果你也在不知不觉中相信了这些，接下来便可想而知，你的弱点将会被自己当作优点不断地加以放大。

吴官正同志不久前讲：“我们加强监督的目的，就是希望领导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我们党总是希望通过教育避免腐败案件的发生，使党风越来越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腐败的成绩不仅在于发现和查处了多少腐败分子，还表现在挽救了多少干部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监督和帮助，那末，“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危险是现实存在的。

因此，一个睿智的领导者，首先要是个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者：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常会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他不仅不会拒绝、而且真诚地希望得到监督和帮助，希望能够依靠领导班子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承担起重大的领导责任。

一个睿智的领导者，还应该是个有“自知之明”者。他明白自己的能力有多大，也懂得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还知道自己有什么弱点。因此，他能够非常冷静地观察形势，知道如何向他人学习，如何取长补短，如何调动起远远超过自己能力的群体的力量。

关口前移、加强监督、预防腐败，也是贯穿于《条例》的一条红线。强调全党都有监督职责；所有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监督；提出加强集体领导；领导干部向组织报告重大事项、述职述廉；强调抓苗头性问题等，无一不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把预防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把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因此，要全面认识党内监督的职责，加大事先和事中监督的工作分量。在有些同志的眼里，监督工作似乎就是调查群众举报，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的同志戏称纪委是党内的“检察官”和“法官”。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不全面。办案的确是纪检部门的一项重头的工作，但纪检部门的眼中不能仅有案子，而要全面地担负起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纪律“监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帮助。同样，组织部门也不能仅限于对干部的调配、任职考察及谈话，除了要通过档案了解干部的过去外，还要注意“跟踪”了解干部的今天。对没有发现违纪行为的领导干部，要发挥一种经常性的监督作用。对领导干部身上出现的一些不好的倾向或《条例》强调的“苗头性问题”，一些群众反映较大的问题，要及早提醒，早打招呼，及时帮助。即使群众举报和反映的问题与事实有距离，也不要轻易否定，而要看看是否有需要警戒之处。

这种监督完全是从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出发的。有人说，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是“天敌”，这个说法显然不全面。对拒绝监督的腐败分子可以这样讲，对于大多数有缺陷的干部来说，用“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同志和朋友的关系来比喻更恰当。

吴官正同志不久前讲：“我们加强监督的目的，就是希望领导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我们党总是希望通过教育避免腐败案件的发生，使党风越来越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腐败的成绩不仅在于发现和查处了多少腐败分子，还表现在挽救了多少干部上。

■党风党纪

求真务实地建设制度反腐体系

□李永忠

求真是因为我们有力量，务实是因为我们有方向。求真务实的精髓，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既是我党思想路线的体现，又是推进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当前，要把求真务实贯穿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重点是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建立健全这一体系，既是我们有力量反腐败的表现，又是巩固我们反腐败力量的保障，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25年改革开放中的反腐败斗争实践充分证明，求真务实既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活力之所在，也是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的关键之所在。当前易发多发的腐败现象，是教育失误，监督失效，制度失范的综合产物。遏制并逐步减少腐败的滋生蔓延，就必须相应地运用思想教育、监督制约和制度规范等综合手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就是把教育、制度、监督三者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全过程以及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它集中体现求真务实的精神，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体现了十六大以来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理念。

这些年来，尽管我们不断加大对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教育力度。但是，由于缺乏监督的措施和制度的保障，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状况没有改变，领导干部少受教育，不受教育，没当学生，却总当先生的状况没有改变。以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场面。为了在反腐倡廉教育中，突出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必须加强对干部教育的制度化建设，必须加强对干部教育的监督和管理，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一种不能不受教育的制度和监督的约束下，用加强教育的强制性来提高针对性，用增强教育的规范性来促进有效性。

由于缺乏监督的措施和制度的保障，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状况没有改变，领导干部少受教育，不受教育，没当学生，却总当先生的状况没有改变。以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场面。

坚持求真务实，通过教育和监督，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是求真务实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治国的有效措施，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分析认识当前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不难看到其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因此，惩治和预防腐败也就必须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期加大工作的力度。一是促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尽快完善，建立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经济基础；二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反腐败的法律基础。这三大基础，既是制度反腐的根本，也是决定制度反腐胜利的关键。要通过教育的深入，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要通过监督的深化，使制度建设更好地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根本性作用。

坚持求真务实，通过教育和制度，强化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求真务实看权力，就可以清醒地懂得权力是柄双刃剑。它既可以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器，又可能成为牟取一己之利的私产。权力的独占性、排它性和扩张性，决定了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保证各级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必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但是不允许，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不存在。要防止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的产生，必须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度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缺乏教育的监督，是盲目的监督；没有制度保障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既要通过教育调动干部群众敢于并善于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更要以制度保护干部群众进行监督。

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看待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健全过程，可以清醒的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既是抓出来的，也是带出来的，更是在这个三位一体的科学体系的作用下，靠教育培养出来的，靠监督约束出来的，靠制度规范出来的。

■历史档案

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源流

□张注洪

回顾20世纪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进程并对其经验作出评价，可以具体阐明中共党史史料学的源流。据此，特将中共党史史料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的发展和经验作如下陈述。

（一） 有计划地保存和征集党史资料，涵盖广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条件，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工作。1926年7月成立的党中央秘书处，其工作职责“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即文书和档案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如上海党团书记发出《关于收集过去文件存底问题的信》指出这部分档案文件“不仅日常需用，且为本党的历史资料，失之殊感痛惜”；为不被国民党军所窃取，“勿速焚灭”，要求各级党组织帮助区委“速即检出”，“愈速愈好”。十年内战中，党中央拟定了《文件处置办法》对文件的搜集、整理、销毁、保管等方法都作了重要规定。长征结束后中央秘书处成立了材料科，实际上担负了党的档案馆和机关档案室的双重任务。抗战中党中央成立了调查研究局，各地高级党政机关和部队师以上机关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收集、保存敌我友各种文件材料。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加强党的文件的保管工作。有的区党委提出“爱护党的文件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有严重情况应有与文件共存亡的精神”保存党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就征集的内容言，不但包括反映和记载党中央活动的资料，各条战线活动的资料以及党在各地活动的资料，而且也包括与党史有关的文史资料和各地方志资料。这项征集工作虽着手较早，但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及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机构建立起来，才更加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开展并取得可观成果(包括征集老一辈革命家早期革命活动史料)。与此同时，这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征集中共党史史料，就要把史料立准，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丝不苟，真实可靠。其方法包括采取分工包干的办法，把任务落实到人，包干到底；通过访问扩大线索，与找到的史料相印证；尽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做好史料的核实工作；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统一安排。这样才能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做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就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条件，建立了自己的档案工作。

●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一向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1936年长征刚结束，党和红军领导机构就整理编纂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回忆录专集。

（二） 较深入地考证和分析党史资料，求真务实，并有了一定的概括。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和成立，就有了党史资料的形成和积累，也就有了对中共党史的总结和研究，而要研究党史，就一定要鉴别分析党史资料，也就必然要作党史资料的考证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当时由于战斗环境或者军务倥偬，在草拟党史文件或撰写党史著作时，很难有机会对党史史料进行细致的考证；即便进行了考证，也不一定有时间把它整理成文公开发表。抗战时在延安，毛泽东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件集时曾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繁重的校订和考证问题。当然这时的考证大抵涉及文献的作者、时代、真伪等问题，不可能作出比较详细、深入的内容考证；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史研究高潮的兴起，关于史实考证的文章始不断发表。有的是专文进行考证，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李清文)、《井冈山会师时间考》(张国畸)、《红军长征几个史实的考证》(王廷科)、《抗日战争开始前后中共中央军委总部机构沿革考析》(钱听涛)、《关于确定新中国成立的时间问题》(钟惠链)、《关于抗美援朝的几个问题(史实考证)》(齐德学)等。也有的在著作中出现作为“考证”而引起研究者重视并提出的，如关于1969年各地战备疏散，长期以讹传讹，认为受“林彪一号紧急命令的迫害”，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讲到，系4月17日晚周恩来宣布“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此次战备疏散。凡此考证都以可靠的史实根据，科学的逻辑论证，令人信服的结论力求对过去不清楚的史实甚至是歪曲的记述作了阐明或澄清，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之同时，也有作者对于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目的、对象和方法做了初步的概括，指出：考证的目的在于鉴别、订正和解释史料，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并以准确史实作为研究党史的基础，考证的对象在于考证真伪、年月、作者、内容、外形、版本，做到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以适应党史研究拓宽加深的客观需要。考证的方法不外利用旁证直接对照，利用当事人记录参证，利用事理逻辑推断，以求做到注重证据、尊重事实，严谨论证。

（三） 多方面地整理和编纂党史资料，真实可信，并有了必要的总结。

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一向重视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1936年长征刚结束，党和红军领导机构就整理编纂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回忆录专集。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时事问题研究会的《抗战的中国丛刊》、《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文摘体系列丛书，毛泽东并为其中一书写了《研究沦陷区》的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史资料的整理和编纂有步骤地开展。在中宣部组织下出版了内部参考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党史资料》(20册)，重印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文献资料集，影印了《新青年》等19种革命期刊和全份《解放日报》，编纂了《星火燎原》等回忆录丛书。及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资料更是大量整理编辑出版。与此同时，对于整理、编译党史文献和资料的论述亦多有发表，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党的文献》发表的“一批以党的文献做基础进行研究”形成特色被誉为“文献学”的佳品。另外还有的作者对编纂史料的原则、角度、形式、内容、体裁、类型做了探讨，并就党史史料的版本问题诸如源流、异同、优劣、真伪、假托、分合、参照、更新八项做了有启发的论述。评述国外党史研究资料的论著也有侯且岸著《美国的“显学”》(人民出版社)，就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的某些史籍做出独到的评析。

（四） 较有效地为现实和研究服务，及时充分，并做出成功的探索。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利用党史资料进行党内教育和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延安整风期间，曾经把党的历史文件印发与会代表，进行路线教育和党史问题的讨论。要总结历史经验，需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党史资料正是这种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进行党史教育就须以党史资料作为最重要的依据。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共党史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取得成就和经验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一、搜集不够全面，特别是关于中共的国际联系和关于生产力、意识形态、社会史、心理史方面的材料搜集不够。已有的中共党史资料工作丰富经验(如关于遵义会议史料的征集等等)，似还宜进一步从史料学研究的角度作出学术性的系统总结。二、考证还欠深入。个别稍加查考即可避免发生错误的记述屡见不鲜。中共党史史料考证的实践颇丰，但多缺乏相应的论述和概括。三、整理史料未尽科学。史料整理和编辑如何正确进行和避免误读误释，尚缺乏深刻的探讨。四、忽视使用价值。个别研究者不重视利用原始的有质量的史料，以至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某些任意炒作的“泡沫史学”现象，时有发生。对于此类问题，虽经指出，但结合实例，就运用中共党史史料如何规范化方面做出深入的论述仍然不够。

■从实践中来

非公企业党组织如何定位自己？

□顾世平

非公企业党组织首先是党的基层组织，要承担党章所赋予的基本职能，但与国有企业党组织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能直接参与企业决策，它履行职能的主要途径是靠团结带领员工来实现，因此，非公企业党组织应该定位为企业员工的政治核心。在履行职能中，需要注重把握好促进与引导，代表与维护的关系，具体在实践中要做到“四个结合”

一、把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与促进企业发展结合起来。

非工企业是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非公企业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执政为民的宗旨是一致的。支持和帮助非公企业健康发展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实践党的宗旨，也是非公企业党组织与企业内部各个方面的共同取向。因此，非公企业党组织首先应该围绕生产经营抓党建，切不可游离企业发展搞党建或站在企业发展的对立面搞监督。

二、把党的政治领导与代表和维护员工利益结合起来。

在非公企业，党组织首先要代表企业员工的正当权益，这是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出发点和前提。由于非公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难免有少数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法律意识不强，道德缺失，损害了职工合法权益，如：拖欠工资和社保基金，不注意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任意延长劳动时间，侵犯员工人身等。企业党组织要及时了解职工的意见和愿望，对企业的内部管理措施进行依法监督，对发生的问题进行有效地协调，组织职工依法理智地（而不是对抗式、破坏性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也要教育职工通过促进企业不断发展，来实现大多数员工的根本利益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三、把引导非公企业和教育企业主结合起来。

非公企业的业主，特别是家族式企业的业主，其本人的素质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发展轨迹。在引导企业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党组织主要是从企业内部发挥有效的监督管理作用。一方面在支持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它出现的问题和不健康的倾向进行教育、帮助和监督；另一方面对有较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要在政治上进行帮助，为他们表达政治意愿提供正当的渠道，对其中优秀分子要及时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四、把坚持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与发挥群团组织的作用结合起来。

非公企业党组织是员工的政治核心，这个定位必须坚持，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式与公有制企业有所不同，即要从直接领导为主转变到更多地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实施间接领导上来。通过群团组织号召员工，把员工团结到党组织的外围。在外资企业中，党组织要特别注意利用《工会法》赋予工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广泛群众性的特点，更好地团结广大员工，维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在非公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还要发挥工商联和各类专业协会的作用，引导非公企业自我调整，形成相互促进，相互监督的自律机制。